

音乐流花新集

中国音乐家之人的艺术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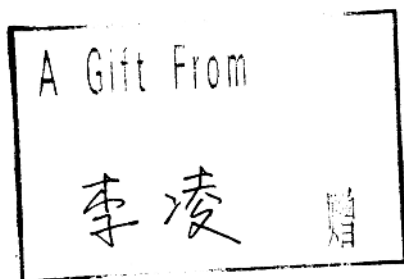
李 凌 著

中国函授音乐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音乐流花新集

李 凌 著



中国函授音乐学院

1998 年 8 月

161063

目 录

音乐评论

我与马思聪

- 思聪三年祭 (1)

鉴今思昔

- 一个受群众敬爱的艺术领导者——周巍峙 (37)

乐坛上的中流砥柱

- 悼念杰出的青年作曲家施光南 (59)

元庆十年祭

- 兼谈几个民族音乐新问题 (64)

忆作曲家张文纲 (72)

她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

- 听彭丽媛硕士研究生音乐会 (76)

广州欢迎你,彭丽媛 (81)

艰难的成功者

- 听高瑞昌的演唱 (84)

《郭兰英独唱专辑》前言 (87)

才旦卓玛

- 乐坛新人之一 (89)

一个路子宽广的歌者——胡松华	
——乐坛新人之二	(93)
顽强战斗的歌唱家——仲伟	(98)
戏曲音乐的继承与革新	
——从蒲剧新秀武俊英的演唱谈起	(100)
不甘随波逐流的歌者——殷秀梅	(113)
艰难新果	
——刘玉玲主演的《孔尚香》观后杂感	(117)
《绿色天国的乡音》前言	(121)
他植根于民间音乐的沃土中	
——《时代的旋律》序言	(125)
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中成长	
——介绍壮族作曲家李学伦	(129)
清泉之水	
——《山河的回音》代序	(131)
一个深受大家敬爱的音乐家——苇舟	(133)
罗念一的套曲《雪城之恋》	(138)
永不泯灭的思念	
——作曲家舒模一年祭	(141)
思聪呵,人民不会忘记你	
——马思聪和中央音乐学院	(150)
从黄虹的歌唱艺术想起	(153)

不管顺境、逆境,都不会把一个有抱负的音乐家的锐气磨消掉	
——兼论青年歌唱家王江平的演唱	(160)
条条大路通京都	
——听高建军、杨小平的演唱会	(167)
董源五年祭	
——一个深受群众爱戴的音乐家	(172)
以情带声,情声并茂	
——听郭颂的歌唱随想	(179)
新歌剧《原野》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181)
器乐音乐教育领域的福音	
——贺《钢琴踏板法指导》一书出版	(183)
为余笃刚的《声乐语言艺术》所作前言	(185)
余笃刚的《声乐艺术美学》前言	(187)
甘香、醇甜的乡土乐诗	
——山西歌剧院的《黄河水长流》	(192)
《沈湘的唱片》序	(197)
听谭佩仪的艺术表演有感	(198)
臻于成熟的艺术创造	
——听粤剧《滨海潮》中潘楚华的演唱	(201)
刘淑芳的成长和成就	(203)
德德玛——不甘于平庸的奋斗者	(207)
从彭丽媛到王菁	
——又一个可喜的民族新歌手	(211)

沈德皓对中国古典歌曲的研究.....	(215)
音乐新事天天多	
——听常熟市董浜乡农民管弦乐队演出有感	(218)
“走向音乐家的道路——马可评传”序.....	(220)
《顾冠仁创作集》序.....	(223)
胡均的《歌曲创作的方法》.....	(225)
余其伟的高胡艺术.....	(227)
一代新的萧笛演奏者	
——黄金成	(229)
太行之魂的交响	
——谈歌舞《风从太行来》	(233)
清新、芬香	
——王方亮的艺术创造	(236)
关于“自古英雄出少年”	
——从老钢琴家张雋伟苦心培育孙女张微微想起	(239)
到处都会有“本国姜不辣”的情况.....	(243)
永恒的纪念	
——《洪飞评论集》代序	(245)
金湘的《诗经五首组歌》.....	(249)
怀念张权散记.....	(251)
一个坚强者的新征绩	
——为薛范同志的《世界电影经典歌曲 500 首》而作	(263)

勤奋努力,百折不挠

- 座谈余章平的独唱会 (268)

纪念刘天华诞辰百周年..... (271)

别具一格现人才

- 钢琴协奏曲《山林》听后杂谈 (273)

骆季超的曲集前言..... (276)

玉不琢,不成器

- 听了众多的优秀青年歌手歌唱随感 (278)

琵琶表演艺术革新家刘德海..... (281)

张锐和他创作的《蝴蝶泉》..... (286)

在男高音歌唱家臧玉琰告别舞台的日子..... (290)

精密、细微、体察入微

- 听俞丽拿的小提琴 (292)

质朴、纯真

- 浅谈黎国荃的指挥 (295)

胸怀宽广,艺术隽永

- 瞿希贤的创作所引起的一些感想 (299)

辛劳一生的硕果

- 为邓映易音乐会祝贺 (306)

联抗同志给我们所留下的功绩

- 联抗十年祭 (309)

偶遇江定仙同志..... (317)

王昆同志的为人、为艺和事业建设 (323)

祝贺黄飞立教授学术讨论会成功..... (338)

赵梅伯先生从事音乐教育事业七十年..... (340)

粤剧革命时代(三十年代)的几位唱腔革新者

薛觉先、白玉堂、马师曾、月儿的唱腔 (342)

薛觉先的唱腔..... (343)

白驹荣、白玉堂的唱腔 (344)

马师曾的唱腔..... (345)

月儿的唱腔..... (346)

哺育音乐艺术的几位长辈

忆周总理和新音乐运动的二、三事 (348)

周总理关于音乐方面的八、九事 (355)

邓小平同志关心音乐事业..... (364)

郭沫若同志关心艺术工作..... (369)

最早培育音乐幼苗的教育家陶行知..... (374)

田汉同志是最积极支持新音乐建设的前辈..... (383)

夏衍同志和音乐..... (392)

旅美音乐通讯

中国民族音乐在美国..... (396)

我国青年音乐家在美工作的艰辛..... (399)

几个老华人音乐家在纽约..... (403)

几个青年作曲家在纽约..... (406)

附录一

香港新音乐运动杂忆..... (409)

附录二

悲剧的解放·····	郭沫若(421)
我的最初的音乐教师·····	(424)

附录三

始终不放弃手中笔的音乐家李凌·····	似 茵(428)
我所认识的李凌先生·····	朱亚荣(431)

我与马思聪

——思聪三年祭

业道同志要我为《音乐研究》写《我与马思聪》，还说：“你和他互相影响不少。”

由于思聪在管弦乐艺术创作有着不可磨灭的成就，日后研究他的不会没有。我写的《论人最好兼及全人》，对他的功过得失的大的方面谈得较多。

是的，我们过从较多，时间也长，互相关心，支持，甚而相依为命，影响不少。在还能执笔的晚年里，趁慕理健在，可以得到她的订正，把一些感受记录下来，以备日后的研究者参考，也是有意义的。

思聪的曲折一生

梁茂春同志在《论马思聪音乐创作的历史贡献》一文的“结语”中谈到：“早期”马思聪曾“被摆在聂耳，冼星海的对立面”。（引自台湾《中华日报》记者《访问马思聪》。）

关于这一事件，是否有过，我不好妄论。梁茂春同志所说的“早期”，据他在文中，“注”，即“三、四十年代”。这就包括抗日

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了。但我了解的情况不是如此。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

思聪很早就有爱国思想，他在30年代后期（1938年）就和金帆（即克锋）合作写了《自由的号声》、《游击队歌》和《让我们》。这期间他还为蔡若虹的词《永生》（为前方抗敌殉难将士作），欧阳山的词《武陵保卫华南》、零工的词《赶走强蛮的鬼子》写了好些抗日歌曲。还写了以英雄故事为题的《石鼓口大合唱》。

30年代末（1939年10月底），我在重庆见到思聪，当他知道我刚从吕骥、星海那里出来，非常高兴。谈了许多关于星海在巴黎的情况，还说：“星海在巴黎生活很苦，朝不保夕，根本无法安下心来学习。是我介绍了一个不要学费的老师指导他学拉琴、作曲，……可惜很快就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而回国。”他对星海的坚决抗日并到延安去，给以较高的评价。他看到我带出来的星海写得《生产大合唱》、《军民进行曲》（歌剧）、《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很感动，他认为星海可以在那里大显身手。

那时，他也刚到重庆，我问他在什么地方工作，“还回不回中央大学？”他说：“不想去。”不久，他就在中苏文协创办的中华交响乐团担任指挥及演奏。

这段日子里，我没有感到他有什么隔阂或戒备。相反，我们谈得很投机，我几乎把我们要在蒋管区的一切工作设想：怎样重新建立新音乐运动战线，出版《新音乐》月刊……都告诉他了。他一点不见外，热情地关心和支持我。

1940年1月，《新音乐》出刊后，读者特别多（当时进步刊物中最多的），很快就销售一空，不得不在重庆重印，并加出《新音乐》增刊。不久，周恩来总理接见我，他向我提出：“当然，你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扩大群众抗日歌咏运动上，团结更多的新音乐工

作干部，这是对的，但也要分出一些精力来做音乐界上层的统战工作。许多音乐专家也是主张团结抗日的，你们要关心他们，人手越多越好，在这方面不能关门，要有一些知名的专家来关心支持你们的事业才好。在这一点上，文学、戏剧、电影都好一些。”他特别点出：“音乐和美术的统战工作差些，是不是啊？”

总理这一启示，使我和思聪的关系，从情感上的朋友，提高到革命的战略上的战友，我珍视他的工作、生活和思想，交往中常常涉及音乐艺术工作和人生、民族命运的关系。

1941年初，因皖南事件，我流亡到缅甸仰光，思聪也因时局动荡，离职到了香港。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思聪也从香港逃回桂林。1942年6月初，组织上让我去桂林主持《新音乐》的编务，我们再次相聚，过从更加频繁，几乎常常会面。那时画家黄新波、余所亚、叶浅予，舞蹈家戴爱莲，诗人徐迟、洪道，文艺家聂甘弩……等人都在桂林，我们常常聚会。还有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由文汇书店出版）的宗玮也在桂林，他是从抗日大学出来的，是一个音乐迷，对思聪特别敬爱，思聪的许多生活小事，他都非常关心。思聪夫妇也很喜欢宗玮那文质彬彬、富有教养的书生性格。

当时，正是世界反法西斯运动进入高潮，文艺界大部分人都汇集在桂林，田汉、欧阳予倩、胡风等人也在那里，他们正利用各种机会，展开反法西斯的民主运动。我和思聪夫妇有时也到他们家里聊天。

7月，田汉、欧阳予倩、吕复、丁波、舒模等人，以演剧四、五、七、九队的名义，在桂林举办了“西南剧展”，公演了他们各自创作的新话剧，七队公演了新歌剧《农村曲》，四个队还联合演出了星海的《黄河》。

四个剧宣队的音乐骨干和在桂林的音乐家，还在7月17日举行“聂耳纪念节”，到会达200余人，由田汉主持，思聪在会上作

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颂了聂耳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贡献。当时的情景，我已在《论人最好兼及全人》一文中作了简短的记载，我认为思聪的讲话确是肺腑之言。

在桂林时期，我们的工作都不多，宗玮在桂林中苏文协搞了个“星期唱片欣赏会”，介绍西欧和俄罗斯的古典音乐，有时也放些近代作品，我们每周还在文协办的一个小咖啡馆聊天，互通心曲。

其时，我们根据聂耳节中的决议：“在目前工作处处都受到压制的情况下，最好利用这时机把一部分工作少一点的干部送到现有的音乐院校进修，离不开工作的朋友，定出计划进行认真地学习。”这也是张颖同志转达周总理的意见。于是我和薛良就向思聪提出，希望他上我俩的和声、对位课，他欣然同意了。

同时，为了推动分散在各省的广大音乐工作者进修，我们还在《新音乐》上创办了“音乐通讯学校”（即函授学校，这是仿效法国的作法），我请思聪为广大学员写篇学习音乐的心得，以提高大家的学习兴趣，他写了《创作经验》（发表在1942年11月号的《新音乐》五卷一期上），他在文中明确地说出了作曲家自己的志趣和意愿：“我就写这个浩大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希望与奋斗，忍耐与光荣。”

这篇文章完全是他自己执笔，刊登时我没有作半个字的修饰，文章精练、优美，充溢着文学才华。我看后对他说：“你看过那么多的中文书，你在语文上花了那么多的心血，我是没有想到的。”他只是笑笑。

思聪在这段时间里，比较有意思的是，参加那次民盟组织的全国科学界年会，旅游“阳朔之游”。年会邀请了在桂林的文艺界作客，目的是利用这坐木船游江的方便，自由组合，为各自的知心友好，提供一个互通心曲的机会。我们这条小船，有思聪夫妇、浅予、爱莲、林路、宗玮、新波、洪道、钟敬文、聂甘弩……。好

友相聚，两天一夜都在一个小船里，尽情吐露，无所顾忌。既谈艺术，也兼及时局，是赏心乐事。

船到浪坪，已是黄昏，大家带了野餐，在浪坪的漓江边宽阔的草地上，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露天联欢晚会，思聪和戴爱莲都表演了节目。喝酒、谈笑、听节目、跳舞，长久的压抑心情为之一消，的确真是“梦里不知身是客”，真没有去想，对手已经准备把在桂林出刊的《七月》和《新音乐》勒死。

阳朔之游，给许多朋友留下很深的印象，思聪也感受很深，那种互相关心，生死与共的眷恋之情，和“十年动乱”中的六亲不认，是相去太远了。

对思聪影响最深的是他们夫妇和我在1943年春节到柳州参加加大后方新音乐工作者年会。四、五、七、九队的音乐朋友汇集在那里，思聪开他的独奏会，还破天荒地开了一场露天独奏会，我们演出了《农村曲》，大型《黄河大合唱》，大家还排演出《新年大合唱》，并举行巡回演出。

这半个多月，思聪和朋友们在一起，还到四、五剧宣队玩了几天，由于亲自接触到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看到这么多朋友的真实心情和无畏的奋斗精神。思聪的确非常激动，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让大家得到温暖（见1947年1月11日《苦闷的音乐家们》第一章，发表在同时期的《新音乐》上海版上，已收入《新音乐论集》）。

有一段关于思聪在柳州举行露天独奏会，到四、五队联欢时心绪矛盾中的记载。

“有一个大作曲家兼小提琴家，当他在柳州露天独奏小提琴，听众没有听完就走了一大半，他非常伤心。但他回到剧宣队里，那几十个歌咏干部笑着抚慰他时，他重新获得力量。他明白，在先前那种场合，这天地更多是属于他们的，但他们是我的。他们缺少不了我，也像我缺少不了他们一样，在他们之前，我方成为我，

我的热和力才能爆炸、发光。”(同上)

他把这心情和看法写信告诉我，我向他噜嗦了不少。我说：“你不必后悔，更不要埋怨，你想想，褴褛的人民，有时连野菜根都吃不到，但他们总是希望幸福、丰美，有时甚至什么都想拥抱，有如在贫困，遭受深重的剥削下，他根本没有接触美好音乐的机会，……。”我说：“你不要嫌弃他们。”

我说了不少之后，从《奥雅金》中引了姐娅雅娜被奥雅金搞乱了心怀，对之爱得发疯时自言自语的话：“我不后悔，也不害羞，我也许不免爱得浅薄（我还附注：如为了你是有名的提琴家而来听），爱得粗鲁，只要爱出于真诚，那是应该乐于接受的，‘真诚’本身应该有这个权利。”(同上)。

思聪读了我这些噜嗦的信之后有何想法，他没有提，从常情而论，恐怕是笑一笑，就是他很不以为然，他从来也不暴怒。但不管多么吃力，他后来还是到处去播种、耕耘，那几首群众爱听的通俗小品，几乎每回都保留在他的节目单上。

3月初，我带了思聪介绍我到重庆中华交响乐团工作的信和他在柳州分别，他回桂林，我们恋恋不舍地南北分飞了。

我参加交响乐团工作，主要是为了学习，在那里听个饱，其次是交些朋友，黎国荃是正在那里任乐团首席。到乐团后，我是非常愉快的，狠命跟着听排练。这些愉悦，我曾写在《去享有那甘美的食粮》（自修音乐读本）上，也把这心情写信告诉思聪。

后来，我感到育才学校音乐组的孩子逐渐长大，但远在北碚乡下，老师黎国荃、范继森、李翠真非常热情，但每去一趟，在路上就要折腾两天多，很不方便，我和黎国荃写信给思聪，因为他对这些孩子看得很重，我们请陶行知先生把音乐组搬到中华交响乐团旁边。我来承担一切，思聪非常高兴，要我经常向他谈谈这些难童的变化。

不久，桂林勒令《新音乐》停刊的通知来了，当然，这打击

对我们是巨大的，但我们不会屈服，“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向前走！”这首短诗写了我们当时的心情。后来这首诗改为《坐牢算什么》在学生运动中起了不小作用。

思聪来信安慰我，很快我们就创办了《音乐导报》，后又改为《音乐艺术》。

1944年初，桂林沦陷，他和慕理带着两个孩子，狼狈不堪地逃难。湘桂撤退，那种惨象是可怕的，的确是给他前所未有的煎熬。他在逃难中，挤在苦难的人群中，亲眼看到人民的灾难，政府官吏和军队的腐败、专横，和革命青年的意志和风貌相对照，在他心中引起无限感慨。他说：“从金城江起步，我们在泥泞中跋涉……着急，心焦，但和剧宣队的朋友，在路上总是常常联系的，他们也非常惦念我。”

他谈到，在路上，剧宣队导演了《金城江之歌》，述说了当时的景况和人民的要求。也说到，他在去独山的路上，常常赶不上到市镇住宿，就在路旁的老百姓家里过夜，他还为他们拉琴。他感到老百姓是纯朴、心地善良和可爱的，他是出于深挚地和他们“苦中作乐”的。

思聪经历了这巨大的灾难，心里充满了愤恨，和端木蕻良合作了《抛锚大合唱》和《民主大合唱》。这两部大合唱，前者描写了国民党对抗战的失误、虚伪、腐败，人民的灾难和苦楚，抗战抛锚了，走不动了，而广大的人民是不甘心的，忧伤、愤怒、抗议，只能行动起来，以求新生。后者更是露骨地揭露了腐败，变乱的实质和人民的出路，高声叫出了“东方的暴君”，他压制人民抗日是绝大的罪恶，只有自己起来抗争，取得真正的民主革新，才能有出路……，的确，思聪已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用音乐来喊出人民的心声，在这两部巨大的作品中，他是动了感情的。我后来把他的《民主大合唱》用五线谱附简谱刊在《音乐艺术》上。

思聪到了贵阳担任了贵阳艺术馆馆长。但实际上还是经常到

昆明等地演出。

1945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西线已胜利，亚洲战场局势也已扭转，日本帝国主义濒于全部崩溃，国内民主运动高涨，各地的民主同盟的运动，大大加强。当时，我正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迅速扩大民主运动；请陶行知先生出来多多关心社会青年的活动，准备创办重庆“社会大学”，思聪也在这时来到重庆。要在春节期间举行独奏会。我们这次会面，正是春天快到，却是乍暖还寒的时刻，人们积极要求民主、改革，而当局却千方百计压制，准备扑灭民主运动。但思聪对抗战的胜利，民主运动的胜利的信心是坚定的。

思聪到后，我们帮助他开好音乐会，他也会见了许多朋友，包括民主人士和音乐界的朋友。他了解了新音乐朋友在青木关音乐学院音专和北碚歌剧学校学习的情况，检查了育才音乐组杨秉荪、杜鸣心，梅贻鑫、陈复君等的功课，他非常高兴。

这段日子里，他和乔冠华、徐迟、金山等人来往较多，我们常常去看金山、张瑞芳他们排练的《红楼梦》。思聪对于当时错综复杂的政局，很想理出一个头绪，我们私下谈论，是没有什么忌讳的。

思聪看到时局动荡不定，不想在重庆什么地方任职，我们也赞同他以巡回演出来维持生活。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我正协助陶行知先生加紧筹备复员上海后创办上海夜大学，专门招收社会青年，大力开展民主运动，育才音乐组也拟搬上海。思聪对这一工作计划是热心赞助的，他还帮忙出了好些主意，并说：“思宏、思琚、思云都会关心你们的。”